



〔加〕谢少波 著 陈永国 汪民安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抵抗的文化政治学/(加拿大)谢少波(Xie, S.)著;陈永国,汪民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8

(知识分子图书馆)

ISBN 7-5004-2557-0

I. 抵… II. ①谢… ②陈… ③汪…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IV. 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2321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25 插页: 4

字数: 155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1.00 元

目 录

道德、政治欲望和《政治无意识》里的乌托邦主义·····	(1)
导论·····	(1)
第一章 语言瞬间之外的异延：詹姆逊与德里达 解构主义的对话·····	(8)
第二章 意识形态的讽喻：詹姆逊与德曼解构主 义的对话·····	(41)
第三章 历史与乌托邦欲望：詹姆逊对弗莱的辩 证礼赞·····	(75)
第四章 詹姆逊的毛情结：学习 60 年代·····	(104)
第五章 第三世界主义与总体制度内的飞地抵制： 解读詹姆逊对鲁迅的解读·····	(121)
结论·····	(154)
参考书目·····	(162)
译后记·····	(174)

导 论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最具革新精神的美国文学理论家，也是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之一。他的著作主题纷呈，范围广泛，从诸种历史理论，解释学，文学批评，文化政治学，到通俗小说，电影，视像艺术，音乐和建筑。他的解读模式更新了我们的文学文本观念，空前地开阔了批评理论和文化政治学的视野。他的政治无意识学说发人深思地中介于文本与历史、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微观政治学与宏观政治学之间，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迄今要么受到忽视，要么受到排斥。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理论卓越地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断言马克思主义是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最有力和最复杂的方法。

即便是在北美的政治形势下，以及在近年来对西方人文学科实行“殖民化”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的霸权统治下，詹姆逊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也无疑是当下理论界最不寻常、最使人困惑的现象。马克思提出的阶级结构在当下消费者社会中似乎已不复存在，消费者社会的统治阶级通过用交互的（consensual）意识形态霸权替代武力统治，发明了远较复杂的“抑制策略”，这是马克思在撰写《共产党宣言》时所不能预见得到的。美国和西欧的物质财富，马尔库塞的“压抑性满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左派的衰落，前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实践的危机，所有这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联手把西方世界转向了非马克思化的路线。非人性化的电脑技术和社会生产、时空和情感结构的逐渐理性化，已经把马克斯·韦伯所

说的“祛幻”(disenchantment)变成了符号和意识的分裂碎片。简言之,文化与社会物质生产之间、现实与超现实之间、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区别的消失,已经导致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的普遍危机。形形色色的后结构主义就是作为这种普遍危机的结果出现的。后结构主义的主符码是绝对化了的差异;其通用手段是“符号的嬉戏”。通过把注意力引向意识和思想的物质性,后结构主义积极地利用符号的语义不确定性,无情地消解诸如真理、意义、本原、秩序、自我和历史等一切久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在抨击社会习俗和制度的过程中无限界地解放了差异和话语。然而,后结构主义关于破碎性和非连续性的理论具有一种与社会现实相一致的反讽倾向,这个社会现实已经是破碎了的、消解了中心的和被分隔化了的。

詹姆逊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重又发起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运动的。与后结构主义相对照,他把马克思的历史改头换面用作他的主符码,依照阿尔都塞的“缺场的原因”和拉康的“真实”建构历史。詹姆逊认为,有一种非文本化的历史,但这种历史绝对拒斥再现,而为了获得进行政治行动的导引,我们需要对不可再现的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进行一种认知测绘。与后结构主义关于破碎性和非连续性的修辞学截然相反,詹姆逊发人深思地坚持把社会生活作为一个关系网络而加以概念化。后结构主义的文本分析集焦点于微观结构的政治学,而詹姆逊则把微观和宏观结构的政治学连结起来,推马克思主义视角为一切文学阐释的难以逾越的视界。詹姆逊的核心论点在于他那横扫一切的格言“永远历史化!”(《政治无意识》,9)。对詹姆逊来说,历史化就是把概念思维与作为“缺场的原因”的历史关联起来,将其浸透于具体的现实性之中,并依据社会政治生活重新思考差异。

詹姆逊理论中非同寻常的“历史”表指亨利·勒费弗尔(Henri Lefebvre)所说的不允许任何封闭的“一个开放的总体性”(《辩证唯物主义》,111)。这样的历史总体性对于测绘一切阅读的意识

形态边界来说则是一条否定标准。詹姆逊作为“顽固的”黑格尔派的信念衍生于这样一种发现，即，不管愿意与否，我们都生活在一种二难选择之中，“历史”作为一种不可再现的总体同时又拒斥任何不成熟的总体化，而任何要破除或解决这种二难选择的努力都必将要全然废除这个物质世界或思维。可以把詹姆逊的历史论恰当地称为“结构历史主义”，借用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的术语说，这种“结构历史主义”“试图提出一种多维度的、辩证的叙述，它同时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它把现在的各个瞬间聚拢在一起，同时提供一个视点，让我们看到从过去到现在而进入未来的运动”（31）。詹姆逊历史辩证法的终极目的是要在以历史性和主体的危机以及批评距离的消失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空间里重新开展一种新葛兰西式的反霸权政治。

在詹姆逊辩证思想中扮演主角的是理论的物化（reification of theory）。在把“历史”作为难以逾越的视界而诉助的过程中，詹姆逊固定了一个优越视点以拒斥一切物化了的理论形式，包括马克思主义本身，并折衷地利用非马克思主义诸种话语的批评洞见。詹姆逊的研究通过以当代的理论术语重新思考诸如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生产等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框架，试图为二十世纪末新的历史语境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他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对话。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指出的，詹姆逊“认真对待其他批评家的理论”，尤其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因为他懂得任何理论都将依其能量来衡量，不是要驳倒对手，而是要把最强大的对手的有用的和富有洞察力的东西归为己用”（3）。他的理论话语可以看作是巴赫金式的对话文本，融会了诸如卢卡奇、阿多诺、阿尔都塞、巴尔特、拉康、葛兰西、德里达、德曼和弗莱等人物的各不相容的理论。詹姆逊对法国结构主义的见习性研究甚至使凯尔纳把他的理论说成是“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与新法国理论的独特综合”（12）。使后结构主义理论家最感到不安的是，詹姆逊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难以逾越的

视界，包容这些显然敌对的或互不相容的运作，给予它们明确的于自身之内的局部合法性，因此在消解的同时又保留了它们”（《政治无意识》，10）。

在以后各章里，我将论述詹姆逊何以通过与雅克·德里达、保罗·德曼、诺思罗普·弗莱的对话而阐述他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他通过阿尔都塞而与毛主义的联系，以及他为建构对后现代主义进行飞地抵制的一种新葛兰西理论所作的尝试。鉴于批评家们在詹姆逊到底是拥护还是反对德里达的思想家的问题上意见不一，所以，探讨詹姆逊对德里达话语如何反应的问题似乎为时过晚。然而，关于詹姆逊的黑格尔—萨特式历时思维与德里达的共时思维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尚无充分的研究，而关于詹姆逊的“历史”观念与德里达的“踪迹—结构”之间的对话交流则根本无人问津。在这方面，最具启示意义的探讨也许来自史蒂夫·贝斯特（Steve Best）和大卫·格罗斯（David Gross）。据贝斯特所说，詹姆逊同化了“后结构主义向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挑战，并通过这次遭遇而修正了那个传统”（345）；在格罗斯看来，“詹姆逊理论中的总体化实践辩证地容纳了异质性和异延”（98）。但他们无暇通过细读而研究德里达新的异延学说何以充实了詹姆逊的历史观念的，以及德里达与詹姆逊之间在总体性问题上的结构对应关系。不言而喻，弗莱的乌托邦欲望在詹姆逊那里从未失去意义，《批评的解剖》在《政治无意识》中的隐约在场使人禁不住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为明显无疑的问题而打发掉。而问题往往就出现在这个“明显无疑”上：詹姆逊是如何把弗莱纳入自己的体系而将其作为他对文化的辩证思考的一个必要阶段的？弗莱的乌托邦欲望与詹姆逊的三个视界的阐释体系之间关系如何？《政治无意识》的两位最卓越的阐释者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和海登·怀特只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粗略的讨论，论述了弗莱文本与詹姆逊文本的关系，但他们至多为充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纯粹的起点。至于德曼与詹姆逊的交流，则大体上无人问津。詹姆逊对他

那位耶鲁同仁所持的缄默在1990年《后现代主义》一书刊出“内在性与唯名论”一文之前一直使读者迷惑不解。我希望能突出詹姆逊与德曼之间比较广泛和含蓄的对话，从而公开他们就意识形态和历史等问题的未予言表的争论。

我对詹姆逊与这些理论大家的对话的阐述将以“历史”为有机范畴，这是理解詹姆逊倡导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整套理论的关键。詹姆逊的历史叙述为他和德里达、德曼和弗莱的对话提供了一个实施性视野。的确，德里达的唯物主义话语解除了真理和意义的神秘性，正如马克思祛除了商品的神秘性一样；德曼与马克思主义的相近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的讽喻阅读模式提供了对意识形态的有力解读；弗莱的乌托邦文化观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关于人类进步的“单一”故事的重述。然而，他们都漏掉了一个重要因素——历史。通过把历史范畴附加在他们的理论之上，詹姆逊巧妙地使他们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所用。这正是我自己的观点和论点介入的地方。正如我的论文题目“在语言的瞬间之外：政治无意识的讽喻”所示，詹姆逊的研究试图在语言的瞬间之外思考，打破共时思维的界限。这里，“语言的瞬间”既是字面意义上的德里达式和德曼式解构主义，又是用来形容共时思维模式所标识的历史瞬间的隐喻，这无疑包括弗莱的原型理论。在詹姆逊看来，走出语言的瞬间之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重写他们的问题框架，把他们共时的深察洞见带入自己的研究中。而“政治无意识的讽喻”则旨在突出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核心论点。詹姆逊的阅读模式与德里达、德曼和弗莱的阅读模式一样无疑是讽喻的。他的政治无意识理论把文本置于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革命的历史视界之内，这常常触发对一个未物化的社会的统一欲望。仅就语言和原型理论都唯独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范畴这一点来看，詹姆逊把文化同时视为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对二者的矫正。

如上所述，詹姆逊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交流的目的是要

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此即关于詹姆逊的毛主义情结和他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飞地抵制理论的探讨何以适合我的整个论述结构的理由。对詹姆逊来说，走出语言的瞬间之外就是建构一种新葛兰西式反霸权的文化理论。他的认知测绘来自毛和阿尔都塞的生产方式或社会联合体（social complex）的概念，他总是据此把异质的复杂的社会生活看作一个内在相关的整体。正是在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打破共时思维的牢笼的努力中詹姆逊才诉助于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观念，他的乌托邦渴望，和他的新的阶级斗争范式；也正是在这同一种努力中他根据第一和第三世界重写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敦促内部和外部的第三世界主义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晚期资本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及其文化逻辑。我对詹姆逊与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争论将不予论述，尽管后者对后现代主义的辩护构成了詹姆逊整个后现代文化批判的背景^①。相反，我将集中论述詹姆逊是如何在他的第三世界主义和飞地抵制理论中发展了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我将举中国的反殖民主义文化政治作为个案研究。

本书并非对詹姆逊的著作进行编年顺序的研究；而是按主题编排所论命题：历史，意识形态，乌托邦欲望和对后现代主义的飞地抵制。第一章详尽分析詹姆逊的历史观念，将其作为超越语言瞬间的德里达差异以及解构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争论的比喻，为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讨论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在这两章中，历史仍然是詹姆逊与德曼和弗莱就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欲望问题进行对话的基础。德曼的讽喻阅读模式产生出对文本和文化的有力的意识形态批评，但他最终把历史与意识形态相认同——在意识形态之外别无其他。相反，弗莱在他的原型文化批评中完全取消了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终结于乌托邦想象开始的地方。通过论证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关系，詹姆逊对德曼和弗莱这两个极端进行了大量改进。再者，如果詹姆逊对共时思维模式的批判导致了葛兰西式文化政治学，那么，这些章节的特定排序就

是有目的的：詹姆逊与德里达、德曼和弗莱的对话之后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论述詹姆逊理论中的毛情结，和他为后现代批评倡导的新葛兰西理论。这个序列试图表明詹姆逊的马克思式辩证法是如何致力于解决共时性思维以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由于接受了弗兰克·兰特里齐亚(Frank Lentricchia)在阅读当代理论家时所接受的相同教训，我将用兰氏的话提醒自己，“站在最糟糕的位置判断某一特定观点的盲目性的人莫过于赞成这个观点的人”(xi-xii)。在充分重视詹姆逊的辩证思想的同时，我希望能与他商榷一些他尚未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 对詹姆逊介入后现代主义争论的任何研究，如果不聚焦于詹姆逊与利奥塔关于后现代文化做出的后马克思主义评价的对话交流的话，就不会是全面的。据詹姆逊言，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有一种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对立；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观念往往伴随着对反霸权对立的 一种阿多诺式的怀恋，这种反霸权对立正是现代主义本身所表现出来的，而在后现代主义中却无法弥补地丧失了。与詹姆逊相对照，利奥塔挑战性地让我们思考二十世纪文化的两个划时代时刻之间的连续性。利奥塔指出，“一件作品要想是现代的，只能首先是后现代的。因此，如此理解的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终结，而是处于一种新生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是衡常的”(《后现代状况》79)。

这两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利奥塔对后现代文化持一种赞成的态度，而詹姆逊则力促对后现代进行否定的批判。这种分歧显见于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宣言：“让我们向总体性开战；让我们目睹那不可再现的；让我们激活差异，保全那个名称的荣誉”(《后现代状况》82)。利奥塔赞扬后现代主义修辞，用以消解对不可达到的或不可再现的东西的集体怀旧。在1992年发表的《后现代解释》一书中，利奥塔重申，“应该清楚地阐明，我们的任务不是提供现实，而是为可以想象的但不可再现的东西发明典故”(15)。这里，我们感到利奥塔也拥有詹姆逊的阿尔都塞式总体观，他的为不可再现的总体性“发明典故”，使人想起詹姆逊建构社会现实的认知测绘的尝试。使他们成为论战的双方的是历史问题。詹姆逊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现实的可再现性，但仍然强调把历史作为阐释历史现象的促进视野，而利奥塔则热衷于总体化历史的坍塌。

第一章

语言瞬间之外的异延：詹姆逊 与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对话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诞生的时代，是向新时代过渡的一个时期。精神已经与它迄今居住和想象的世界决裂，从属于把它淹没在过去、淹没在自身改造的劳作之中的头脑。精神的确从不静止，而总是向前运动。

——黑格尔，《现象学》

在所有的当代理论家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许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能像詹姆逊这样设法获得如此众多称号的批评家几乎寥寥无几。的确，强加给他的那些各不相容的称号让人眼花缭乱：如结构主义的“杰出”代表，“反结构主义者”，德里达解构主义恰当的靶子，尼采式的解构主义者，“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的文化批评由于其后现代主义的总体化叙述而使一些读者惊而却步，又由于把阿尔都塞的历史观念作为一种不可再现的“缺场的原因”而引起另一些读者的反感。据康奈尔·韦斯特所说，“詹姆逊首先是写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卢卡奇的忠实而具批判眼光的信徒”（“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177）。诸如 R. 拉达克里施南（R. Radhakrishnan）等批评家申斥詹姆逊的反结构主义立场，并用“一种同一性的伞盖”压抑德里达和福柯的“变动性和异质性”（拉达克里施南，317—319）。从拉达克里施南的解构主义视

角来看，詹姆逊理论中的“差异”变成了漂浮于历史之上的一个柏拉图式概念（319）。然而，在另一方面，诸如罗伯特·肖勒斯（Robert Scholes）则把詹姆逊解作“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尼采和德里达路线上的后结构主义者”，因为他试图超越伦理学上善恶的二元对立（肖勒斯，273—274）。我们可以以下列方式指出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如果詹姆逊是个解构主义者，那么，这个范畴怎样才能与总体化乌托邦规划相协调呢？如果詹姆逊如拉达克里施南所说是对于后结构主义差异概念全然无知的一位反结构主义者，那么，这是否与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观念同时又与人们的社会存在先于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相违背呢？

在社会经济上以晚期资本主义为特点、文化上以后现代主义为特点、认识上以后结构主义为特点的一个历史时刻，詹姆逊的理论和文化批评决不应该处于能够超越这个历史时刻的任何优越位置。相反，“詹姆逊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已经意味着一种相区别的同一性。如果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在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被置换的马克思主义，那么，“詹姆逊式”这个形容词就一定指马克思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进一步置换。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本章才提议探讨詹姆逊与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关系问题。我将首先讨论詹姆逊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重写了德里达的“差异”和“书写”概念，然后，我将继续探讨德里达的语言异延（differance）和符号的“踪迹—结构”与詹姆逊的历史异延（differance）和历史的非共时时刻概念之间在方法上的一致性。最后，我将分析这两种话语之间的根本差异，把詹姆逊的话语展示为超越解构主义语言视野之外的重构理论。

1. 异延与历史

德里达批评哲学的源生或奠基概念是异延，它同时既指差异

又指延宕。德里达的异延源出于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关于符号的任意和差异性概念。据索绪尔所说，语言是一个差异或差异关系而无肯定术语的系统。所有的符号都是任意的约定俗成，而在能指与所指、符号与指涉物之间不存在自然的或本质的关系。索绪尔认为差异优越于同一性，因为同一性衍生于差异。换言之，意义或同一性是压抑差异或变动性的结果。索绪尔的这个语言和意义模式一经转换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便开始了一场真正的思想和书写革命。德里达把异延定义为

不再以在场/缺场的对立为基础而构思的一个结构或运动。异延是差异、差异的踪迹和诸因素得以相互关联的间隔（spacing）的系统嬉戏。这种间隔同时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没有这种间隔的产生，“完整的”术语就不能指意，就不能发生作用。（《立场》27）

这里，异延被视为既不是在场也不是缺场的东西，而是异延使指意过程成为可能的嬉戏。如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所注意到的，“异延因此既表指已经在位的一个‘被动的’差异，作为指意的条件，又表指产生差异的区别性行为。英语中一个类似的术语是间隔（spacing），它既表指编排又表指分配或编排的行为”（97）。“间隔”这个术语是这段文字的关键。它也是詹姆逊所说的词语或能指的“相互关系”。意义或意义的踪迹“是物质能指的相互关系产生的一种效果”（“后现代主义与消费者社会”119）。这样的异延就成了本原的本原，然而，“异延不是。它不是一个此在的存在，不管多么完美，独特，或超验。它不控制任何东西，不主宰任何东西，不在任何地方行使权威”（德里达，“异延”414）。

德里达在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中所要做的就是为“本原”、“中心结构”、“总体性”和“自治的主体”等传统概念祛幻。他有

力地揭示了意义和真理是如何“构造”和“生产”出来的，而不是什么等待着发现的本体的优先存在。他揭露了自柏拉图以来控制一切形而上学写作的指意规则，用他新造的“异延”拆解了这些规则。他的“原书写”（arche-writing）或“原踪迹”（arche-trace）等概念不仅强化了索绪尔的区别的同一性概念，而且还颠覆了索绪尔把言语凌驾于书写之上的在场的言语与缺场的语言之间的二元对立。德里达不是通过颠倒了原来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通过打破言语与书写之间的界限而重构了这个二元模式。书写或原书写（arche-écriture）是一切语言的基础，无论是口头的或是书面的，因为语言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一个差异关系的系统。差异相互关联。正是这种差异关系使直言思维（categorical thinking）成为可能。德里达所说的“书写”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线性和语音标志，而是产生意识、思维和意义的原始本原（primordial origin）。因此，“一切有能力生产，即是说，有能力抹掉它们自己的名称、利用分类式差异的社会都实践一般书写”（《文字学》109）。这样的书写或语言表指一种双重姿态：一方面，它试图有区别地命名或辨别不能简约的差异，另一方面，它总是始终揭示自身的不充分性。换言之，在德里达的话语中，“书写”既为一个原始的差异命名，又指要压抑那个差异的欲望的内在焦虑。

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或异延只不过是那个原始差异的一个踪迹，这同时既是又不是语言：

那个超验的原书写 [archie] 的价值在自身被抹掉之前必须让人感到它的必要性。原踪迹的概念必须既服从那个必要性又服从那个涂抹。踪迹不仅是本原的消失……它意味着本原非但没有消失，它要不是由一个非本原、即那个踪迹而相互构成的话就从来未被构成过，因此，那个踪迹就成了本原的本原。（《文字学》61）

书写的踪迹结构是真理和意义之源，而这样的书写又是涂抹之下的书写的一种双重姿态。说踪迹是“一般意义的绝对本原”就等于说不存在一般意义的绝对本原。踪迹总是区别和延宕，在试图为自身命名的同时为一个他者命名：“它在呈现自身的过程中抹掉自身”（“异延”415）。符号的踪迹结构是“差异的滞留（retention）和延续（protention），一种间隔和延宕，无数踪迹的嬉戏”（“异延”408）。这样的符号总是表指符号的时间差异的空间秩序以及对那个空间转换的时间解构。因此，德里达的踪迹结构指的是一个不可追溯的过去，和一个永远延宕的未来，断言自身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瞬间之内。

“踪迹”这个术语，用来指称无法命名的差异或异延的另一个超名称（paraname），对于德里达和那些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应用解构主义洞察力的人来说具有至关重要性。如兰特里齐亚所指出的，“踪迹”有助于恢复德里达思想中被忽视的历史维度：

换言之，正是在符号的踪迹结构中我们可能找到德里达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最根本的抨击，因为正是在被视作踪迹的符号中，作为一个自体（in-itself）的现在才被打破，并被重构成滞留和延续的一个综合，即把二者作为过去和未来的一种关系。（《新批评之后》175）

德里达的“踪迹结构”概念分解了语言，或同一性概念，使其变成一个运动不止的过程。符号的每一瞬间对于那个不可追溯的整体都是一个否定瞬间；符号在压抑一个过去和一个未来而成为自身的一个瞬间的过程中，仅仅通过成为一个他者而获得了它的同一性。符号通过忘却而变化。它的自我证实就是自我否定。为那个踪迹命名就等于开发它的整个历史。

如是阐释的德里达解构主义似乎与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天生的”亲缘关系。二者都把差异关系视作价值或意义的本原。对二

者来说，事物从其与他者的关系中衍生同一性。正如马克思通过祛除生产过程和商品交换的神秘性而消解价值、主体和社会的形而上学概念一样，德里达也通过有力地揭露真理、本原、意义和同一性何以不是直接的或固有的，而是由意识形态的中介产生和构成的，而解构了这些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在抨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固有的制度方面都具有一股颠覆的政治力量。鉴于在普遍的社会规模上与资本主义进行公开斗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所以，实际上可以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视作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有用的增补，以佐其在微观结构的层面上重新发动宏观结构的社会批评——即是说，把公开的阶级对峙转换成文本分析的领域。詹姆逊及时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德里达解构主义之间的结构一致性。在《语言的牢笼》中他发表了对德里达颇具洞见的评论，通过描述德里达的“踪迹”观念、黑格尔的“本质”观念和马克思的“既定性”（givenness）概念在方法上的相似性，而把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捏合在一起。“说一切语言都是一个踪迹，”詹姆逊指出，“就是强调指意过程的悖论：即是说，为了注意到它的存在，它就必须是已经发生过了的”（《语言的牢笼》175）。詹姆逊把德里达的“踪迹结构”观念与黑格尔的“Wesen ist, was gewesen ist”（本质就是已经发生过的东西）联系起来，于是把德里达的“踪迹”转译成“一种已经发生了的”东西（《语言的牢笼》175）。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一事物的概念并不说明事物自身；正是事物在具体瞬间所变成的东西表明它的同一性。因此，一事物的名称始终指称已经发生过的事物，而那个已经发生过的事物的名称对于这个事物在下一个瞬间所要变成的东西来说就不是一个恰当的名称了。

詹姆逊称赞德里达“对书写观念的阐释力的出新看法”给“马克思主义留下了一个敞开的余地”（《语言的牢笼》177）。在论证原书写是可能的指意过程或事物的文本再现的条件时，德里达最贴近马克思，对后者来说，社会生产关系的网络使人的意识、

主体位置或以意识形态为动机的对社会现实的再现成为可能。据德里达所说，“一般的书写涵括了整个语言符号领域，”因为“制度的观念——因而还有符号的任意性的观念——在可能书写之前和在书写的领域之外都是难以想象的”（《文字学》44）。对詹姆逊来说，德里达的“踪迹”思想与阿尔都塞的“总是已经给定了的”（*toujours-deja-donne*）观念是重合的，因为德里达始终强调“现在或意识的似是而非的结构，总是已经在位置上、在环境之中，总是在时间和存在上先于自身”（《语言的牢笼》184）。阿尔都塞的“总是已经给定了的”，与德里达的“原书写”一样，消解了那个“具有某种原始本质”的虚假问题，因为我们所要做的是“总是事先给定了的东西……不管知识将回溯到过去多远”（阿尔都塞，引自《语言的牢笼》184）。詹姆逊把这一立场据为己有，在《政治无意识》的前言中给阅读下了定义，其方式与德里达的“原书写”观念如出一辙：

因而，《政治无意识》开阐释行为动力学之先河，而作为本书谋篇布局之虚构，假定我们从未真正直接面对某一文本，从未领略其作为物自体的全部鲜活性。相反，文本总是作为已经读过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通过前此阐释积淀下来的不同层次或者——如果是崭新的文本的话——通过继承阐释传统积淀下来的阅读习惯和范畴来理解文本。（9）

不存在直接的客体或对客体的认识；看似直接的客体总是已经受到社会制度的镌刻，而我们对客体世界的了解始终是对过去的知识的重写。德里达的“踪迹”和“原书写”始终指向先于个人行为 and 思维的出现而存在的社会制度网络。实际上，那个网络或“既定性”也可以看作是拉康所指的象征秩序——无处不在的他者或无意识话语。个人总是出现在已经存在的象征秩序中，他们对那个秩序的反应和态度表达他们的社会意识形态立场。用来表示